

试论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特征及处境

李艳枝

内容提要 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阿拉维派穆斯林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决支持者、左翼政党的同盟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抗拒者。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土耳其共和国给予阿拉维派穆斯林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为其摆脱边缘化处境提供了有效的空间。随着传统纽带的进一步瓦解,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宗教色彩将进一步淡化,世俗化将成为其必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土耳其 阿拉维派 政党政治 世俗化

阿拉维派(Alevî 又译努赛里派,阿拉伯文“Nuṣair”的译音)是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尽管其宗教思想中含有伊斯兰教什叶派和苏非派思想、基督教神学以及安纳托利亚传统文化思想的因素,但学术界一般将其归于伊斯兰教什叶派。阿拉维派在土耳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很长时期内被视为伊斯兰教中的“异端”派别,深受正统穆斯林的压制和迫害,因而该派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边远的山区,与外界相对隔离。土耳其共和国推行的凯末尔主义改革排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统治,给予阿拉维派穆斯林平等的公民权。阿拉维派穆斯林积极参与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受益者。笔者认为,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社会地位和政治处境的变迁是土耳其民主政治变革的缩影,随着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维系阿拉维派穆斯林的传统纽带将进一步瓦解,其世俗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社会处境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一、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概况

1. 阿拉维派穆斯林在土耳其处于宗教少数派的地位。阿拉维派穆斯林是土耳其境内与逊尼派穆斯林对立的群体,其人口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 20%。¹ 在世界上,阿拉维派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土耳其和叙利亚,但两国的阿拉维派穆斯林没有组织和思想联系。本文所讨论的仅指土耳其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土耳其的伊斯兰教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与安纳托利亚传统文化整合而产生的派别,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因为与主流信仰迥异,阿拉维派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曾遭受统治当局的残酷迫害,但作为民间伊斯兰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并形成了在奥斯曼帝国颇具影响的贝克塔什教团²的主体力量。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内部又有若干支系,各支系分别尊奉不同的创派圣人,每一支系在服装、命名、舞蹈、礼拜仪式甚至礼拜时间上都有很大的区别。但各支系都强调爱先知、爱阿里、遵循十二伊玛目,尊奉某些圣徒。”

¹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Hemingford Grey: Eothen Press, 1999, p. 137.

² 该教团由哈兹·贝克塔什(Hacı Bektaş)创建于13世纪,神化阿里、强调先知穆罕默德与阿里的合二为一是其突出特征,该教团的教义整合了什叶派信仰、突厥传统文化与神秘主义思想。该教团如今主要活跃在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等国。

³ Gurcan Kocan and Ahmet Oncu “Citizen Alevi in Turkey: Beyond Confirmation and Deni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7, no. 4, December 2004, p. 474.

在土耳其大规模城市化之前,阿拉维派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贯穿安卡拉 (Ankara)、乔鲁姆 (Conm)、阿马西亚 (Amasya)、萨姆松 (Sam sun)、托卡特 (Tokat)、锡瓦斯 (Sivas)、卡赫拉曼马拉什 (Kahran am aras) 等省的带形区域,另外在宾格尔 (Bingol)、埃拉泽 (Elazig)、埃尔津詹 (Erzin can)、通杰利 (Tunceli)、马拉蒂亚 (Malatya) 诸省的东部和迪亚尔巴克尔 (Diyabakir)、加济安泰普 (Gaziantep) 等省的东南部也有少量分布。现在除了这些传统分布地之外,有相当大数量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居住在大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还有一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作为劳工移民居住在西欧各国。根据种族和语系,又可分为土耳其族人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库尔德族人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前者主要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山区;后者主要居住在库尔德族人聚居区的西北部,另外在东南部、西南部也有少量分布,形成库尔德族人和土耳其族人的过渡带,20世纪 70年代在这个地区曾发生过逊尼派穆斯林和阿拉维派穆斯林之间的激烈冲突。¹

2 阿拉维派的宗教思想具有混合主义特征。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阿拉维派是一种宗教混合体,其思想中含有伊斯兰教什叶派和苏非派思想、基督教神学以及安纳托利亚传统文化思想。

根据土耳其宗教词典,“Alevi”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意指“阿里的追随者与支持者”。²阿拉维派通过特定的宗教仪式来赞颂阿里和纪念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这与什叶派信仰相同。阿拉维派穆斯林除了尊奉《古兰经》和什叶派的圣训外,还将《天命》(Buyruk, 相传由第六代伊玛目加法尔·本·穆罕默德著)作为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和讲经布道的基础。该书强调了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合二为一,如在《天命》第二节中指出穆罕默德曾说过如下的话语:“你(阿里)的血液就是我的(穆罕默德)的血液……你的肉体就是我的肉体,你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你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你的精神就是我的精神。”“阿里是真主的代理人,向阿里礼拜即是向真主礼拜。”加法尔作为什叶派教法的创立者成为相对独立的加法尔派的先驱,而加法尔派又是十二伊玛目派的前身,所以说阿拉维派具备了什叶派的基本特征。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摩萨 (Moosa) 也强调:“他们(阿拉维派穆斯林)应被视为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对阿里的极端崇敬毫无疑问应属于什叶派的范畴。”³因此,尽管阿拉维派穆斯林并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属于什叶派,但研究者将其归于什叶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阿拉维派的宗教思想中包含浓厚的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苏非派作为民间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在 13世纪之后得到广泛发展,并形成相对独立的苏非派教团。阿拉维派作为被官方排斥的信仰派别,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同支系尊奉不同的苏非派导师作为自己的创始人。民族社会学学者大卫·希科兰 (David Shankland) 在谈到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农村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时说:“每一个宗教领袖都认为自己来源于不同的创始人,其中一位甚至将其谱系上溯到伊本·阿拉比。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哈兹·贝克塔什的信徒,隶属于那些他们认为是继承哈兹·贝克塔什衣钵的被称为艾芬迪 (efendi 土耳其语对伊斯兰长老的称呼——引者) 的人。”⁴哈兹·贝克塔什创立了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贝克塔什教团,因其什叶派倾向和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军团的密切关系而受到倡导现代化改革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镇压,但今天仍有许多阿拉维派穆斯林定期拜谒位于克尔谢希尔省 (Kirsehir) 的贝克塔什的陵墓和道堂(苏非派

¹ Martin Van Bruinessen “Kurds, Turks and the Alevi Revival in Turkey”, *Middle East Report*, no 200, July-September 1996, p 7

² 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 55页。

³ 转引自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p 141.

⁴ M. Moosa *Extramist Shi'it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39

⁵ David Shankland, “Alevi and Sunni in Rural Anatolia: Diverse Paths of Change”, in Paul Stirling (ed), *Culture and Economy: Changes in Turkish Villages* Hemingford Grey: The Eothen Press pp 33-34

教团活动的场所),这充分说明苏非派传统对阿拉维派穆斯林信仰的重要影响。就宗教仪式而言,阿拉维派穆斯林通过被称作“赛姆”(cem)的集体礼拜和舞蹈以及高声赞念“齐克尔”(Zikir 对真主的赞颂辞)来纪念殉教的侯赛因和哈桑,具有鲜明的神秘主义特征。

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基本信仰强调“控制住自己的手、嘴和生殖器”,也就是说禁止偷盗、撒谎和通奸。对此,大卫·希科兰指出:“这些规定并非阿拉维派独有,在整个突厥文化中随处可见,在神秘主义或苏非主义中,这就是所谓的修养。不过,阿拉维派把它们提高到了权利与义务的高度,因而成了他们区别于其他伊斯兰教派的重要特征,这其中,不是兼容了而是抵斥了‘五大支柱’(即伊斯兰教“念、礼、斋、课、朝”五功——引者注)。”¹阿拉维派穆斯林还从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行吟诗人²和音乐家那里汲取营养,出现了著名的阿拉维派神秘主义诗人于那斯·埃默瑞(Yunus Emre)、皮亚·苏尔坦·阿布达尔(Pir Sultan Abdal),还创作了与礼拜相对应的舞蹈、音乐仪式。另外阿拉维派穆斯林妇女可以平等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她们不必戴面纱或与男子隔离。这说明阿拉维派穆斯林将本土的突厥文化和伊斯兰信仰结合起来,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

阿拉维派还从基督教中汲取营养。在信仰体系方面,阿拉维派信仰安拉、穆罕默德、阿里的内在统一性,与基督教的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阿拉维派的许多宗教仪式还与基督教信仰实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日常生活中,阿拉维派穆斯林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表示同情和支持,这固然与二者在土耳其都属于宗教少数派有关,但二者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与政党政治

1. 阿拉维派穆斯林是凯末尔改革的支持者。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以凯末尔为首的共和国统治精英采用一系列西方式现代化改革方案实现国家机构的权力重组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在摒弃传统伊斯兰势力的政治统治之后,将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全面贯彻到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改革中。尽管在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期间曾经颁布苏丹敕令,给予帝国内一切民族平等的权利,但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形势,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贯彻实施,所以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阿拉维派穆斯林第一次真正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摆脱了长期所处的政治和宗教依附地位。“正统逊尼派反对什叶派的思想总是为(逊尼派)歧视和压迫(阿拉维派)提供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共和国,阿拉维派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平等,有了保护他们的法律”。³因此,阿拉维派穆斯林将凯末尔视为其宗教利益的保护者和拯救者,坚决支持凯末尔推行的各项改革。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对凯末尔的崇拜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该派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宣称他们对阿塔图尔克⁴的爱与对隐遁的第十二任伊玛目马赫迪的爱一样深。⁵

土耳其共和国为了强化本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排斥伊斯兰教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宣称前伊斯兰时代的土耳其本土文化是真正的民族文化,伊斯兰教则是外来文化。⁶而吸收了土耳其本

¹ David Shankland “Alevi and Sunni in Rural Anatolia: Diverse Paths of Change”, in Paul Stirling (ed.), *Culture and Economy: Changes in Turkish Villages*, p. 53.

² 即以诗歌形式赞颂伊斯兰早期辉煌文明的人。

³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p. 146

⁴ Lale Yalcin-Heckmann “Ethnic Islam and Nationalism among the Kurds in Turkey”, in Richard Tapper (ed.), *Islam in Modern Turkey*, London: I. B. Tauris, 1991, p. 105

⁵ Atatürk的音译,意为“国父”。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建国后被称为国父。

⁶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p. 151

⁷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p. 98.

土文化成分的阿拉维派穆斯林被视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保护者和民族意识的承载者,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认为阿拉维派穆斯林信仰的才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土耳其人应该继承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卫·希科兰曾分析说:“阿拉维‘文化’(剔除了什叶派神话与传统落后因素)连同它对正当行为、对共同体的责任以及对集体音乐、诗词、歌舞的强调,能够很好地融合于凯末尔主义哲学,并为他们提供指导生活的都市道德标准。因此,阿拉维派穆斯林几乎毫无例外地是那些倾向于阿塔图尔克和社会民主政党的支持者。”¹

阿拉维派穆斯林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支持还体现在支持国家发动的语言改革运动。阿拉维派穆斯林是用土耳其语做礼拜和进行宗教实践的,他们称真主为“坦瑞”(Tanrı 旧土耳其语对真主的称呼)而非阿拉伯语的“安拉”。他们还积极参与“公民,说土耳其语”的运动,²积极接受经过“语言纯化”的新土耳其语。在 1925 年土耳其的库尔德族人发动第一次叛乱时(这次叛乱带有浓厚的逊尼派宗教色彩),库尔德族人中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共和国站在一起,进行了反对叛乱的斗争。尽管库尔德族人中的阿拉维派穆斯林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1937—1938 年发动过反对凯末尔主义与共和国的斗争,但并未大规模参与库尔德族人逊尼派穆斯林的反政府武装叛乱,而且库尔德族人中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发动的这些为争取政治权利和提高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与库尔德族人中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民族分裂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土耳其世俗主义改革的目标是不让宗教与政治混为一体,并实现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使宗教信仰成为公民的私事。但精英政治的固有弊端使得其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广大民众的心理认同,经历了凯末尔改革的大部分土耳其人仍将逊尼派信仰作为社会认同的基础。因此,尽管阿拉维派穆斯林在凯末尔改革时期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为其打破隔绝而向外移民提供了契机,但其社会边缘化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并且对世俗主义的坚持也使阿拉维派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宗教文化传统,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对生存的需求排斥了对宗教终极意义的追寻,这就为其以后宗教色彩的淡化埋下了伏笔。

2 阿拉维派穆斯林是土耳其左翼政党的同盟者。土耳其向多党民主制的转化过程,也是民众扩大政治参与的过程。1950 年土耳其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民主党主要依靠农村选民的支持以绝对优势击败长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打破了精英分子控制土耳其政坛的局面,这给主要居住在乡村的阿拉维派穆斯林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民主党放松宗教控制,强调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伊斯兰教在民主环境中的复兴提供了重要条件。

经过凯末尔时期的发展,在土耳其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中,乡村的阿拉维派穆斯林逐渐打破封闭、隔绝的状态,向大城市和欧洲国家移民,并逐渐通过接受正规教育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开启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坛出现左、右翼的分野,在这两种政治势力对峙的格局中,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左翼政党与阿拉维派穆斯林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所以这一时期阿拉维派穆斯林继续支持共和人民党等左翼政党。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和宗教右翼极力寻求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导致在左、右翼政党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中也充斥着阿拉维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和斗争。例如,为了煽动民众对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恐怖情绪,一些逊尼派穆斯林曾制造谣言称阿拉维派穆斯林将向清真寺投放炸弹和向饮水中投毒,结果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右翼

¹ David Shankland, “Alevi and Sunni in Rural Anatolia: Diverse Paths of Change”, in Paul Stirling (ed), *Culture and Economy: Changes in Turkish Villages* pp. 61–62

² 20 世纪 20 年代土耳其世俗主义者为推动土耳其文字从阿拉伯字母向拉丁字母转化而发动的要求非穆斯林如土耳其的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说土耳其语的运动。

力量发动多次针对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左翼主义者的大屠杀。¹ 这也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为了遏制因阶级、宗教和民族分化而引起的暴力冲突加剧之趋势, 1980年军人第三次干政。但由于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库尔德工人党赢得库尔德族人中的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广泛支持, 所以当局不得不通过强化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宗教认同来避免分离的发生。这就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土耳其阿拉维派的发展, 如出现了哈兹·贝克塔什纪念活动的繁盛和阿拉维派出版物大量涌现的现象。

出于争夺选票的需要, 土耳其的许多政党都努力争取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支持, 几乎所有的政党都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研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问题, 民主左翼党甚至成立了由阿拉维派穆斯林领导的委员会,² 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政治重要性日益凸显。据统计, 在 1965—1995年期间举行的九次选举中, 阿拉维派穆斯林主要支持左翼政党, 其中, 1965年大选对共和人民党的支持率为 63%, 1969年大选对统一党(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政党)的支持率为 33%, 1973年大选对土耳其统一党的支持率为 50%, 1977年大选对共和人民党的支持率为 97%, 1983年大选对人民党的支持率为 80%, 1987年大选对社会民主平民党的支持率为 64%, 1991年大选对社会民主平民党的支持率为 83%, 1995年大选对共和人民党的支持率为 53%、对正确道路党的支持率为 39%, 1999年大选对共和人民党的支持率为 45%、对民主左翼党的支持率为 27%。”³ 这表明在土耳其民主制的发展过程中, 尽管左翼政党并不是土耳其政坛的主宰者, 但阿拉维派穆斯林基于意识形态的接近性而选择支持左翼力量, 以借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终结和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土耳其左翼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阿拉维派穆斯林对各政党的支持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由于 90年代初社会民主人民党在联合政府中的无所作为, 一些阿拉维派穆斯林调整政治立场, 转而支持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 当然大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仍然支持坚持世俗主义的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左翼党。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民间组织“阿拉维贝克塔什联盟”在 2004年地方选举中支持共和人民党。该联盟主席阿里·多干 (Ali Dogan) 说: “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所支持的任何政党在这次选举中都未能完全理解民主制度和民主法则, 但左翼政党要比其他政党好得多。”⁴ 这足以证明尽管左翼政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阿拉维派穆斯林仍将其作为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在 2007年大选中, 正义与发展党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再次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而得以主宰土耳其政坛, 但对这次选举中选民宗教归属的统计表明, 绝大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还是选择投票支持共和人民党。

3 阿拉维派穆斯林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抗拒者。 尽管在凯末尔改革时期由于国家对宗教的严格控制使伊斯兰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 但作为土耳其民众认同基础的伊斯兰教仍然在秘密的状态下继续发展。随着土耳其多党民主制的启动和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控制逐渐放松, 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出现强劲的复兴势头, 在土耳其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伊斯兰复兴运动时, 阿拉维派穆斯林却反应冷淡。这一方面表现在其对恢复宗教教育的态度上, 有资料指出: “在许多阿拉维派穆斯林居住的农村, 这些宗教课压根就没有人理睬, 因为没人想上”;⁵ 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伊斯兰政党的态度上, 自 20世纪 70年代起埃尔巴坎 (Erbakan) 先后创建民族秩序党、伊斯兰拯救党和繁荣党作为正统伊斯兰教的政治代表, 这些伊斯

¹ Grcan Kođan and Ahmet Öncü, *Citizen Alevi in Turkey: Beyond Confirmation and Denial*, vol 17, no 4 December 2004, p. 477.

² “Alevi Groups Support Leftist Parties in Local Elections”, *Turkish Daily News*, 23 March 2004.

³ David Shankland, *The Alevi in Turk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p. 205–207.

⁴ “Alevi Groups Support Leftist Parties in Local Elections”, *Turkish Daily News*, March 23, 2004.

⁵ Howard A. Reed, *Turkey's New Imam - Hatip Schools*, Leiden: E. J. Brill, 1995, p. 153.

兰政党也是右翼力量的组成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对这些政党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们极力避免投票支持这些政党,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害怕伊斯兰教逊尼派复兴后阿拉维派穆斯林将重新处于受迫害地位的心境。

从 1980年起,土耳其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极大地偏离了凯末尔主义,将土耳其民族主义与穆斯林宗教感情糅合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宗教课成为学校教育中的必修课,宗教事务局的权威得到加强,不仅在逊尼派穆斯林聚居的乡村,而且在阿拉维派穆斯林聚居的乡村新建了大量的清真寺,任命了许多伊玛目(Imam, 伊斯兰教职人员),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呈现强劲的复兴态势。阿拉维派穆斯林认为在其聚居区修建清真寺是对其宗教信仰的破坏和同化,于是通过加速发展来对抗当局的举措。当 1989年解除结社禁令后,大量的阿拉维派穆斯林组织迅速遍布全国,出现阿拉维派穆斯林知识分子出版宗教书籍的热潮,还出现针对阿拉维派宗教属性的争论:阿拉维派究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还是一种独立的宗教?阿拉维派也实现了从秘密的、古老的、地方性的、口耳相传的宗教派别向具有固定形式、书写规范、信条和仪式制度化宗教派别的转变。许多宗教学者还极力整合阿拉维派的宗教信条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精神,试图在现实的政治框架内推动土耳其阿拉维派的发展。

随着土耳其选举政治的日益完善和伊斯兰力量的高涨,伊斯兰政党为了获得更多选票,也试图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中构筑阿拉维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认同的基础。宣称“感谢真主,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拥有共同的古兰经、共同的先知、共同的国家和共同的统一旗帜”。¹ 繁荣党曾经引用皮亚·苏尔坦·阿布达尔的名言“来,让我们成为一体”作为竞选口号,以吸引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支持。但阿拉维派穆斯林对繁荣党仍然持否定态度,在 1995年大选中,对左翼政党感到失望的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甚至投票支持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等中右政党,企图阻止埃尔巴坎获胜。

阿拉维派穆斯林与正统伊斯兰势力的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例如:1995年两名阿拉维派穆斯林在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枪杀,此事引发了阿拉维派穆斯林针对逊尼派穆斯林的骚乱,造成多人受伤;几天后由于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对阿拉维派穆斯林嘉宾说了一些冒犯性话语,又激起了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反抗情绪,电视台被愤怒的阿拉维派年轻穆斯林层层围住,并向窗户投掷石块,一度造成混乱;1998年一名美德党(Virtue Party)领导人被指控发表激化宗教矛盾的言论,再次引起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² 随着时代的前进,土耳其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也逐渐认识到斗争和冲突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而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这个坚持务实、开放的伊斯兰政党极力淡化宗教色彩,尽力避免宗教矛盾激化,结合欧盟关于民主、法制、尊重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要求,给予阿拉维派穆斯林等宗教少数派较为广泛的政治权利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尽管大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仍然支持共和人民党,但逊尼派穆斯林和阿拉维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逐渐趋于平静。

三、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社会处境

1. 维系阿拉维派穆斯林的传统纽带进一步瓦解,地缘关系和公民意识逐渐成为阿拉维派穆斯林的认同基础。20世纪 60、70年代,大批阿拉维派穆斯林纷纷离开与世隔绝的偏僻山村向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和德国移民。居住地域的分散和外界思想的浸染,动摇了阿拉维派穆斯林传统的信仰基础,使阿拉维派穆斯林移民的传统宗教实践被弱化甚至被抛弃。由于阿拉维派穆斯林

¹ David Shankland *The Alevis in Turkey*, p. 165

²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p. 133

大量向外移民,乡村的阿拉维派穆斯林聚居区难以为继,传统血缘纽带关系逐渐解体,宗教领袖的权威逐渐下降,这一方面因为阿拉维派穆斯林中宗教领袖的继承人移居城市甚至外国或死亡而无以为继,又不能从非圣裔家族中得以补充,造成宗教领导人继承困难;另一方面因为地域限制,宗教权威对移居大城市和欧洲国家的阿拉维派穆斯林鞭长莫及,不可能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因而影响力下降;再一方面因为在共和国的统一管辖下,官方任命的世俗官员承担了宗教领袖的部分功能,民众逐渐接受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宗教领袖的权威和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地缘关系和公民意识等现代思想逐渐取代传统观念而成为阿拉维派穆斯林认同的基础。另外,接受了世俗教育的年轻一代阿拉维派穆斯林开始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严格遵守宗教仪式,并将婚礼和葬礼上许多传统的歌曲与舞蹈视为约定俗成的习惯而非宗教实践的组成部分。因此,阿拉维派穆斯林在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面前,借助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有利环境,重塑社会认同的基础。阿拉维派穆斯林除了积极支持左翼政党之外,还支持追求平等和同等工作机会的妇女团体、军方和部分商业组织。对生存和利益的追求淡化了对宗教终极意义的追寻,所以就宗教本身而言,阿拉维派穆斯林的信仰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呈现衰落的趋势。

2 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宗教色彩弱化,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凸显。宗教世俗化是当今世界宗教发展的普遍性趋势,但学术界对宗教世俗化之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如:有学者认为宗教世俗化是“信徒被世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所吸引而对宗教产生的一种淡漠的潮流”;¹美国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则把宗教世俗化称为“神圣物质的匮乏”;²大多数学者将宗教世俗化理解为“宗教日益关心此岸的人类事务,而不再以专门服务和向往于彼岸的上帝或天堂为宗旨。”³宗教的世俗化是一个宗教意识、活动和机构逐渐失去社会重要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功能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逐步弱化,社会运行变得理性化并摆脱宗教的控制,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和象征纽带的社会功能则逐渐增加。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发展趋势正好暗合了宗教世俗化的内涵。

另外,对人本身而非对神灵的关注也是宗教世俗化的重要表现。阿拉维派认为,人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神圣的真主的需要。伊斯梅尔·麦廷 (İsmail Metin) 在其著作《阿拉维宪法》中指出:“阿拉维派的终极目标是人本身,每件事情都和人息息相关,没有任何机构或实体能超越人本身,人是如此伟大,万物与其相比永远是处于第二位的。”⁴阿拉维派对人本身的强调、对自我的肯定和重视是其世俗化倾向的反映,而逊尼派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通过强调真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化乌玛⁵的统一性和共同体意识,所以二者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存在一定区别。

3 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发展引起国家的关注和支持,但阿拉维派穆斯林若要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边缘化处境,还需进一步努力。由于意识形态的分化、土耳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不同政党争取阿拉维派穆斯林选民支持的需要,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政治重要性更加凸显,所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加大对阿拉维派穆斯林宗教场所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也为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活动提供帮助。1995 年,坦苏·奇莱尔 (Tansu Ciller) 政府将宗教事务局预算中的 30 亿土耳其里拉用于修建遍布土耳其的赛姆威斯 (Cem evi) 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礼拜场所,以使阿拉维派穆斯林能有固定的礼拜场所,并成立专门的基金会来指导和监督赛姆威斯的修建,这反映了国家对阿拉维派的认可。在 90 年代后期,政府对阿拉维派穆斯林领导人伊兹提·多甘 (İzzettin

¹ 陈铃光:《现代宗教的世俗化趋势》,载《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第 14 页。

² [美]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 页。

³ 冯丹:《当今世界的宗教世俗化倾向》,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⁴ 转引自 David Shankland *The Alevi in Turkey*, p 167

⁵ 阿拉伯文 Umma 的音译,意为“公社”、“社团”,指穆斯林聚居区。

Dogan)的活动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多甘也与当局关系密切,他与德米雷尔总统私交甚好。祖国党和民主左翼党联合政府也曾为争取阿拉维派穆斯林在宗教事务局中的代表权做出了努力,主张在学校的宗教课教材中编入关于阿拉维派的内容,政府还打算将贝克塔什镇(Bektasi)作为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国际交流中心,并在土耳其的电视频道中播放有关阿拉维派信仰的节目,耶尔玛兹(Yilmaz)总理和埃杰维特(Ecevit)副总理还支持加强对阿拉维派文化的研究。¹ 国家支持筹建第一个面向阿拉维派穆斯林的高等教育机构——阿拉维大学,通过研究阿拉维派文化和培养阿拉维派穆斯林学生以提升阿拉维派的文化影响力。塞姆瓦克夫(Cem Vakfi)基金会在伊斯坦布尔建立阿拉维派活动中心,旨在将阿拉维派纳入国家宗教政策之内,使阿拉维派成为国家承认的、合法的宗教派别。1997年该基金会组织了一次有关土耳其宗教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宗教事务局也派代表参加。阿拉维派的锡瓦斯节也得到官方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加强国际交流、保持阿拉维派的宗教和传统文化的目的。²

四、小 结

尽管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阿拉维派穆斯林开始从边缘群体逐步融入核心社会,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目前其整体状况仍然不容乐观。阿拉维派穆斯林学生在学校仍要接受逊尼派的宗教教育。在宗教事务局中没有阿拉维派穆斯林的代表,不得不完全接受宗教事务局的控制,获得合法的宗教地位是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虽然土耳其官方并没有表示对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歧视,但阿拉维派穆斯林中很少有人在国家政权机关任职,他们大多从事教师、博物馆员等政治色彩较淡的职业,并且由于种种束缚,他们中很多人并不能工作到退休或是及时得到升迁。在土耳其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中,他们还往往是政党斗争的牺牲品。今天,尽管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做出尊重人权、尊重少数民族利益的姿态,倡导多元主义的发展战略,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但在多种因素的掣肘下,阿拉维派穆斯林若想摆脱社会边缘化处境、融入主流社会,还需要多方做出更大的努力。

Abstract As a religious minority in Turkey, Alevi's doctrines consist of Shiism, Sufism, Christianity and Anatolia folk culture. Even so, academia classifies them as Shiite in term of its essence. In the course of Turkish modernization, Alevi support Kemalism, form alliance with leftists, and fight against political Isla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urkish democracy and city more and more Alevi leave their isolated countryside and migrate to big citie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so their traditional ties have gradually collapsed. Because Alevi are firm supporters of secular parties, they are inclined towards secularization. Now, even though Alevi have been given equal civilian rights and more support in politic, economy, and culture, it is not easy to change their marginalized status in a short time.

(李艳枝, 助理研究员,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 110034)

[责任编辑: 丁克定]

¹ Neslihan Ozturk, "Alevi Education Given Big Boost", *Turkish Daily News*, 11 September 1997.

²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p. 165.